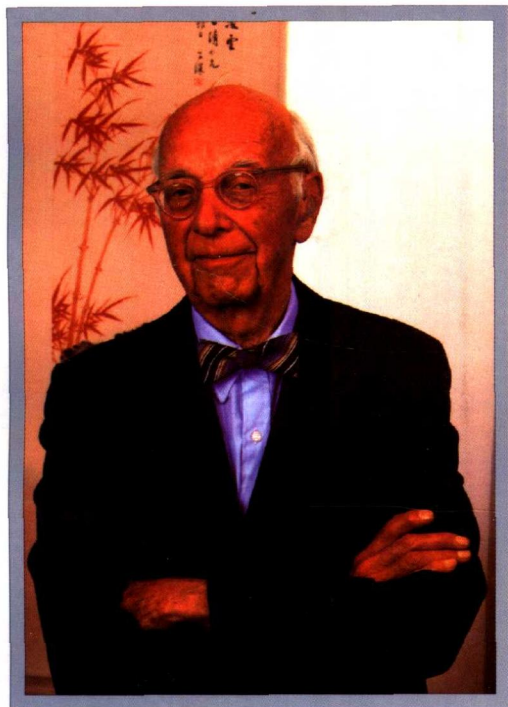


# 费正清的世界

## 同时代人的回忆

保罗·柯文 默尔·戈德曼(美) 主编



东方出版中心

AIRBANK REMEMBERED

6518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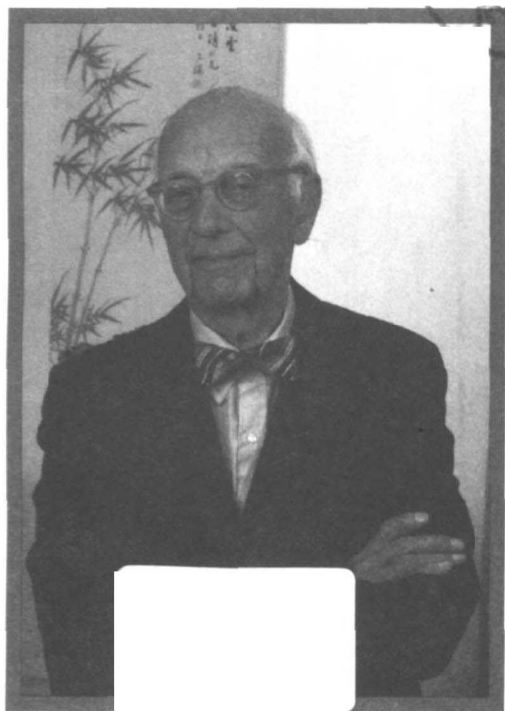
# 费正清的世界

## 同时代人的回忆

保罗·柯文 默尔·戈德曼(美) 主编

朱政惠 陈雁 张晓阳 译

金光耀 校译



东方出版中心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费正清的中国世界——同时代人的回忆/(美)柯文  
(Cohen, P. A.), (美)戈德曼(Goldman, M.)主编;朱政  
惠,陈雁,张晓阳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0. 3

书名原文: Fairbank Remembered

ISBN 7-80627-513-4

I. 费… II. ①柯…②戈…③朱…④陈…⑤张… III.

费正清—纪念文集 IV. K837.1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5707 号

---

## 费正清的中国世界——同时代人的回忆

---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址: 上海市仙霞路 335 号

电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00 千

印张: 8.75 插页: 2

印数: 2,000

版次: 2000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27-513-4/K·68

定价: 14.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译者的话

《费正清的中国世界——同时代人的回忆》一书(原名《回忆费正清》),1992年出版于美国。书的主编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保罗·柯文教授、默尔·戈德曼教授。

集子的文章,由美国和世界各国的中国学家、汉学家,以及教育界、出版界、新闻界、政界的有关学者、专家撰著。文章表达了对这位当时去世不久、深受人们尊敬的学界前辈——杰出的中国学家的深切怀念和由衷敬意。撰稿者从各个角度阐述了费正清的学术思想、学术方法、治史特点及其历史影响和地位,追忆了和这位学者交往特别有意义的事件及其详情细节。

阅读这部集子,我们首先得到的深刻印象就是关于费正清的学术贡献。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费正清学术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创立当代中国学。这种“中国学”,就是有别于偏重语言学、文化学、传统汉学的中国学。它和欧洲传统汉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特别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从而导致一种被称之为“新汉学”的中国学的形成。

费正清认为,那种以为中国的原始资料不可、甚至中国人的视野也不必要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西方人那种仅仅依靠英国、法国和美国档案史料来写中国学著作的做法,已经风光不再。费正清认为,对西方原始资料的依赖,反映了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所以他竭力推动新的研究,主张深入发掘中国的史料,开展对人口问题、社会流动问题、知识分子倾向、文化史、经济制度、税制、考试制度等问题的系列调查研究。正是这种调查研究,开启了新的天地,

标志着新的中国学的诞生,从而跨出了举足轻重的一步。

关于费正清的这一治学思路,史华兹作了很好的解释。他说,他的著名的清代文献的研讨班,就属于这类拓荒者的努力和尝试。“旨在运用以深奥的古汉语撰写的文献,作为理解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的资料来源,而不是用来进行语言学的分析”,他努力鼓励一些人相信,“从人类所想问题的普遍性角度看,理解和掌握中国过去的文化甚至是可能的,尽管我们在研究中,都带有各自文化包袱的深深烙印”。史华兹强调,费正清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概念,牢固建立于这样的信念之上:“倘若我们没能使自己完全沉浸于晚期传统中国的领域之中,我们就永远无法理解现代中国。”

戴维·尼维森在回忆中这样写道:相当一段时间来,西方的中国研究分成两大对立的流派:一些学者写作或谈论现代历史,只是基于通商口岸或传教士的经历,常常是对中文一窍不通或对中国早期的历史一无所知;另一些学者有良好的中文素养,但他们只研究那些中国学者已经研究了几个世纪的语言学的问题,却从未成功地将中国作为一个现存的实体来加以研究。“现在需要将这两个流派各自的优点融合到一起,形成对中国正确的、立体的认识。”这就是费正清中国学的特点。尼维森说,费正清的观点在于,要做到此点应研究所有的资料,就好比十九世纪的欧洲历史学家在研究某一事件或某人生平时所做的:包括相关的信件、随笔、日记、方志和国家文件,无论这些资料是用什么文字写成。“当有机会这样做时,还要兼顾过去和现在这两个方面”,“他的学生和更年轻的后来者都继承了他的方法,并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将其推而广之”。尼维森指出,费正清中国学方法的核心思想在于:“历史学家应该有全局眼光,特别是应看到历史的全貌,要将这些东西常记脑海,并常要设身处地地考虑,在这个问题上,究竟一个有思想的中国人会怎样想怎样做,这样才可能得到完整的思想史。这一理念的形成,

是费正清最有成效、最有组织的努力中的一项。”

诚然，费正清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有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为其坚实后盾。费正清所有的规划和设想，都通过这一中心操作、实施。这部颇怀感情的回忆集，谈到了费正清创立和发展东亚研究中心的贡献。亨利·罗索夫斯基评论道：“无论如何，要没有他，这里不仅不会有这么多数量的成就，也不会有这么高的质量，更不会有这么多的欢乐。这是千真万确的。”“约翰不仅是推进学术机构的热衷者，也是学术传道团中的重要一员。在这一点上，近代哈佛历史上无人能与他相比拟。他对哈佛的热爱和关注，他对课题的热情，在我们的大学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在学者们看来，费正清的这块纪念碑将永存。在美国，中国研究领域已发展成为一个由学者和管理者、研究计划和研究中心、联合委员会和国内协会组成的巨大学术团体。“它是一个智慧的帝国，一个太阳永远不落的帝国，费正清将永远被当作第一位皇帝来怀念。”亚历山大·伍德塞德说，费正清之所以能成功，还在于他建立了一个巨大的交流的网络，“约翰甚至是传统中国学者的美国化的翻版”，“通过与同事、学生通信、写备忘录，而建立了一个巨大的网络，他是这个网络的中心和源头”。

现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傅高义对这位奠基者的出色贡献是这么评价的：

事实上，在费正清所建立的东亚王国中并没有什么第二任的君主……在哈佛的中国研究领域中，费正清是伟大的奠基者和机构缔造者。他的继任者不是某个人，而是一群学者。我们这些坚守在这里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同龄人，在各自不同的学科工作，也有着不同的学生群。就我而言，我们从我们色彩丰富的同事关系、民主协商和广泛的学术领域中，看到了我们的巨大的优势。但是，如果没有一位自信的不懈的斗士，开垦

拓荒并创建我们的东亚王朝，我们无法像今天这样欣欣向荣。

傅高义肯定费正清作为创立东亚研究中心“奠基者”和“缔造者”的地位；还谈到费正清培养学生群的问题。在傅高义看来，东亚研究中心之所以如此“欣欣向荣”，费正清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正在于他培养了一大批中国学研究专家——业已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国学家。

关于这一点，《良师益友》篇有很多类似的感人描述。学者们写道，费正清是崇高的历史学家、智慧的导师、多产的学者、非凡的学术创业者。“这个国家的三代当代中国问题学者都受到他的惠赐”，“他的激励、培训和对其他人不计其数的鼓励，照亮了美国人的前景”。“他对我们的监督，如他所希望的，有的时候就像马刺一般鞭策我们，当然，总是以友好的方式，或者，以最好的父亲般的方式……他这个榜样一直在那里，而且不断更新；也许可以更恰当地说，这是他影响他的学生和无以计数的其他人的一生最为有效的方法……”“他具有一种天赋，能使他的学生感到——并不总是舒服——他真正地关心他们——从学术研究到为人处事。他希望他们不仅博学，而且正直，他自己的一生就是最好的榜样。”

这本书的相当多的篇幅，都谈到这种师生之谊，谈到费正清教学的成功之道和学术的所以成就之道。费正清是有宏大学术理想的学者。他深信中国学研究之树长青，在于新人辈出，在于桃李满天下。

此点，又恰好体现了他超人的智慧、品质、组织才能、人格魅力的一面。我们不妨再引用史华兹的一段评论。他写道，“我从来没有见到有人像约翰那样，在国家的和学术的范围内，有能力调度如此大的人力和物力来完成他的使命。在我脑海中闪现的形容词是‘专心’、‘奉献’、‘多谋’、‘坚持’和‘钟情’。”短短评语，淋漓地揭示了费正清这非同一般的才干和品性。他所强调的费正清对学术事

业“专心、奉献、多谋、坚持和钟情”，一言中的，很多学者有同感。墨子克就这样说，“在著名学者中，这是一种很不寻常的品质”，他补充说，“他聪颖的洞察力，而不是他的组织能力，使他声名卓著”，“他不仅使现代中国史成为世界上最有趣的历史学领域之一，而且在发展这个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方面，也比任何其他他人干得多”。墨子克指出，“谦虚也许是他最突出的品质”，“费正清以十分的自信，完全替代了被人感到重要的需要。我认为这种很不寻常的成就，是他超凡魅力的基础，是他能令人敬畏的基础，是他受人爱戴的基础”。

关于费正清研究中国学的动机，很多学者也作了分析。大家以为，其积极的努力，在于期望推动中美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增进友谊。出于这一点而走向中国，走向现实，走向风云多变的国际事务和纷繁的国际学术交流之中。谢伟思写道，费正清不是一位象牙塔内的学者，“在我看来，作为历史学家，他极不寻常”。“对他来说，历史一直延伸到昨日。也许正是这一点，鼓舞着他与美国及中国的公众人物保持着极其广泛的联系”。

罗斯·特尔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费正清相信：越是更好地了解中国，就越能与中国和睦相处。“每一个他教导的研究全都在缩小隔阂，使这个世界更光明，更安全一点”。罗斯·特尔写道，1943年，费正清就已表态——“我站在他们那边”，他说，“费正清拥护一个统一的中国的历史性回归……正如费正清预料，九十年代是另一个时代。”罗斯·特尔指出，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与西方是不可割裂的，必须像学世界史一样研究这段历史。把中国假想成与美国一样是错误的。正是由于坚持了中国的不同性，费正清才有效抵制了长期来美国人在中国只寻找他们想寻找的这一倾向。罗斯·特尔认为，这是费正清灌输给他印象最深的观点。

1997年是香港回归祖国年，看看香港一位学者的回忆文章也许更有意思。他说，当香港在1842年割让给英国时，香港就已出



现在他的视线中；他肯定会很有兴趣地看到1997年回归中国以后发生的一切。“约翰是一位井井有条的历史学家，香港回归中国将完全象征着他自己所研究的那一段西方影响的时期的结束。但是他会想得更远一些。”“他不会把香港回归中国看作是一个结尾。他完全会把这看作是一个历史的新开端，他的后继者们将以他在60年前开始时的精神从事这一段历史的研究。”

古今中外很多国家的史学都有经世的传统。了解、研究和认识历史，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为了人类美好的未来。费正清的史学思想，显然与此有关。他的研究中国的现实动机正在于，推动地球另一端的人民了解中国，促进世界和平事业。关于费正清的史学经世思想，保罗·埃文斯介绍说，费正清事实上已向人们揭示了有关学者品德的概念和应该追求怎样的学术生活。在费正清看来，学术和大学应该介入公众政策，当然，它们的价值应超越这些。“最好的老师不需要离开大学即可服务于社会。”

诚然，由于文化与社会制度的隔阂，外国人看中国难免有隔靴搔痒的缺陷。由此，对费正清史学经世思想内核及其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关系等问题，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探讨和理解。

这本集子中，我们还饶有兴趣地阅读到一些学者对于费正清学术贡献的评价。有学者这样提出问题，说费正清实际上所建构的是学科而不是派系，这种中国研究是“多样化的、广泛的、多元的和充满生机的”。施图尔特·施拉姆认为，“如果没有费正清，就几乎不可能看到像现在这样广实的基础，勃勃的生机和兴味盎然的研究舞台。”有的则评论，“费正清……是一位学派的奠基人。”费正清创立中国学派，足以和法国年鉴学派的成就并驾齐驱。艾德西德称，“二十世纪历史编纂学中唯一可与之相提并论的”，就是法国巴黎的年鉴学派，这一学派的特点在于——“研究方法的统一而不是结论的统一”。

把费正清的中国学和法国的“年鉴学派”相提并论,这可是一种新鲜的见解,诚然,会有一些不同看法。但,关于费正清的精神和学术遗产的丰富,恐怕是没有什么歧见的。小施莱辛格说,“约翰的特别深刻的印象在于,他不仅给后人留下的一系列优秀的、权威性的著作;而且,他贡献给了几代后辈学生慷慨的时间和精力,由此开辟了一个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当我想起约翰的时候,常常不仅想到他慷慨的精神、博学的成就、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勇气,而且也想到,他在交际中总是那么有趣。”法国的白吉尔在回忆中写道,“费正清的去世不仅对美国的汉学家来说是一个巨大损失,对法国的汉学家来说也是如此……我们都受惠于他对现代中国研究的有力且成功的促进。”她说,在有着古典汉学悠久传统的法国,要把现代中国研究建成一个受人尊敬的研究领域是十分困难的。在我们努力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极大地依赖于费正清为我们建立起来的先例,跟随着他已开创的道路”。俄国著名中国学家齐赫文斯基撰文道,“在俄国,我们将永远记住这位在中国历史和美中关系问题上杰出的权威,记住这个代表美国学术界最民主和最人道传统的、有伟大学术成就的人。”这些著名学者的见解,说明了费正清中国学的崇高的学术地位。正如台湾的一位学者所说,费正清的研究和他为促进学术机构和个人对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所提供的帮助,“是永远不会被全世界汉学领域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所遗忘的”!

目前,海外中国学已发展到十分可观的地步。研究队伍已发展到相当庞大的程度,总数不下于万人。各种专门研究机构迅速扩展,包容广泛的资讯系统纷纷建立。由于海外中国学研究人员的不断充实和素质提高,分科研究成果及其经验的大量积累,现代化电子技术手段的介入,许多社会科学家(包括自然科学家)参与探讨,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的趋势正在形成。国际一体化趋势,使国外成千上万人的研究队伍能够发挥比以往单干大得多的

作用。要言之,海外中国学成就已到了不容国人忽视的地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认真研究海外中国学,学习取鉴其经验,非常必要。有的学者就这样说,一个全球都在改革开放的信息时代,如果不充分利用世界的智力来研究中国,受到最大损失的,首先是我们自己。毫无疑问,要了解现代海外中国学,当先研究美国中国学;要把握美国中国学,不妨多研究费正清中国学。这本译著的特点,就在于较详实地介绍了费正清创建美国中国学的大体过程,介绍了他的主要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及其令人瞩目的成就,以及作为杰出史家的人品人格,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了解美国中国学的一面镜子。

1996年3月,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成立不久,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保罗·柯文教授即访问中心,赠送了这部英文版的著作。此后,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教授亲自来函,同意将这本书译成中文,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保罗·柯文教授和默尔·戈德曼教授还撰写了中文版前言。经过一年努力,这本译著终于付梓面世了。我们谨向支持这本书出版的傅高义教授、保罗·柯文教授、默尔·戈德曼教授表示衷心谢意。

## 英文版前言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泰斗。虽然在这本书中收集的颂词、实录和回忆,用文献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及费正清其他方面的不凡经历,但对此的阐述和论证还见于其他著作。<sup>①</sup> 此书的撰稿者多数是费正清的学生(甚至是学生的学生),但也包括亲戚、老朋友、国内外的专家同事,以及他在积极投身于其中的各种场合活动结识的熟人。他们追忆了与费正清私人交往中特别有意义或有启示作用的细节详情。这些生活片断凸现出主人公机敏、热情、鲜明个性、深深感人和欢乐有趣的不同侧面。它们聚集起来就组成了这本十分亲切和内容诚挚感人的书,作者们不仅要这样来写关于费正清的事,而且,他们也要这样来写费正清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性。

由于给予了作者随心所欲写作的自由,所以某些话题包括附带事件,便接二连三地冒了出来。也因为人们的记忆并不一致,同一件事常常叙述得很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如对费正清的个性和举止方面的描述(当然,我们不仅面对着回忆,也面对着不同人的不同观念),作为编辑,我们只去修改容易核实的经验方面的错误(如日期、地名、人名、书名的拼写等等),但不会去修改有分歧的定性方面的回忆。

---

<sup>①</sup> 参见费正清的《心系中国:50年回忆录》(中文本名《费正清自传》,纽约哈勃一娄出版社,1982年出版)和保罗(Paul, M. Evans)的《费正清和美国人眼中的现代中国》(纽约贝恩尔·布莱克韦尔出版公司,1988年出版)。——译者注。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努力保持每一个作者自己的“声音”。我们也没有强求所有撰稿人使用单一拼写法(如威氏拼音),但我们却想在每一篇里保持一致。有的作者喜欢用团体或机关全称的首字母缩略词(例如战略情报局缩写为 OSS),我们尊重这种偏爱;当然,我们也提供一张缩略词表,可供读者参考(此表已删略——编译者注)。因为作者们在书中所挑选的一些称呼:费正清教授、JKF、费正清、约翰等<sup>①</sup>,通常直接用来表示他们对费正清的个人感觉,或与费正清的关系,所以我们十分注意保持材料的原来形式。作为编辑,我们主要对文章的冗长和文体风格两个方面的问题作些修改。至于较大的改动,除非作者事先给了我们随便削减的权力,否则我们都要征得作者本人的同意。

仅仅用一种粗糙和近似的方法,把百余个片断串联起来组成一本十分连贯的书,确实是不小的挑战。经商定,我们决定打破年表和内容之间的均衡。因为很多人的回忆录,涵盖了很长时间的跨度和不同的主题,所以我们要断定什么样的文章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们把这本书看作是一个由许多个可交换部分构成的拼盘。如果我们的一些考虑和选择,在放置上不当,或者说,与你们作出的选择不同,敬请读者宽恕。

把回忆录收集起来编成小册子的建议,是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提出来的。从一开始,他还不断给予了鼓励和各种实际的帮助;格罗波(Alison Groppe)把手稿打印出来,并为该书的完成,做了很多其他工作;麦卡茹(Daniel McCarron)设计并管理了该书的出版;威尔玛(Wilma Fairbank)就事实正确性核对了原稿;劳扎达(Eriberto Lozada)利用了他熟练的计算机知识;茹贝尔(Brett Rubel)提供了行政上的支持;戴娜(Anne Denna)对出版过程经济方面的问题,作了很严格的管理;彼得(Peter Amirault)和汤

---

<sup>①</sup> 费尔班克或约翰·费尔班克或JKF,中文皆译为费正清。——译者注。

姆斯(Thomas Pixton)耐心和熟练地处理了出版过程技术方面的事务;思特沃特(Gwendolyn Stewart)在封面照片方面给予了有价值的帮助;基纳姆(Katherine Keenum)对文章素材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有专长的建议;南希(Nancy Hearst)细心地核对了最后的校样。对上述各位,我们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保罗·柯文  
默尔·戈德曼

## 中文版序

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位西方学者对近代中国的研究的影响,可以超过我们的老师费正清。作为一名教授、良师益友、行政负责人、公众教育家、顾问人员、历史学家,他影响了好几代的学者、政府官员、以及新闻记者和企业经营者。他的影响不仅在美国,而且,通过他的著作,在欧洲和世界的许多其他地方,广为人知。他在哈佛大学执教几乎有50年的历史,他个人的专著、与人合作的著作、及其主编的著作有几十本之多,他还撰写了数百篇的学术论文和书籍评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离开哈佛到华盛顿和中国的政府机构工作。在他的漫长研究生涯中,他的建议和忠告赢得了政府高级人士的重视。

这本回忆录,是由他的学生、同事、朋友、亲人所撰写的;那时,费正清去世不久,回忆录谈及了他生活方方面面的很多事,不少文章激起了人们对他的深深怀念。概而言之,这些回忆突出的主题在于描述费正清毕生的道路,他全身心投入于对中国历史、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研究,其中的一个成果,结晶于题为《心系中国》(1982)这部自传体的纪念集中。无论人们如何讨论这些问题,费正清总是在寻找一条使它和中国有关联的道路。

因为“中国”通常是一个政治争议的话题,费正清的著作和出版物不可避免地不时会使他遇到麻烦。早在五十年代的美国、六十年代的台湾,以及冷战时期的中国大陆,都会遭遇到一些政治攻击。但是,他几乎没让这种政治干扰影响美国公众进行关于中国问题了解的努力;在六十年代,他还是美国中国学学者中带头试图

说服华盛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明智政策的学者，这都给他带来了荣誉。

1979年中美两国官方关系正常化后，蒙代尔副总统邀请费正清陪同他去中国，这一努力几乎用了30年的时间。在对北京大学的演讲中，副总统转向费正清并介绍说，“费正清教授所做的努力要比任何人都多，迎来了今天中美关系的重新确立。”此刻，自发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在成百名听众中响起。一位陪同副总统访华的老资格的记者说，要不是这次来中国，他还没听到过如此热烈的、激动人心的掌声。

在中国，费正清要比任何别的美国中国学家都家喻户晓。他曾于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时期，住在中国相当长日子。1972年，作为对周恩来总理及其他有关人士所表达的意愿的反馈，他和夫人重访了这块久违了30年之久的故土。费正清的很多著作早已为广大中国学者所熟知。眼下这一《回忆费正清》（即《费正清的中国世界——同时代人的回忆》——译者）中文版的出版，将使中国读者有机会全面了解这位作了巨大努力以促进中美两国相互了解的他，而这个集子中的故事都来自于他所接触的人们。

保罗·柯文

1997年11月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



## 费正清生平年表

- 1907 5月24日,出生于南达科他州的休伦
- 1911 举家迁往南达科他州的苏费尔斯
- 1923 进入新罕布什尔州菲力普斯·埃克塞特学校
- 1925 进威斯康星大学
- 1927 转入哈佛大学
- 1929~1931 获得罗兹奖学金,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
- 1932 2月到中国为其博士论文做研究;初夏,在北京与威尔玛·迪尼奥·卡侬(Wilma, Denio·Cannon)结婚
- 1933~1935 任北京清华大学讲师
- 1935 圣诞节离开中国返美
- 1936 秋,在哈佛大学任教
- 1941 8月,进华盛顿特区情报协调局远东组工作
- 1942 被情报协调局(1942年6月改名为战略情报局)派往重庆
- 1943 年底返回华盛顿,调陆军情报局远东部
- 1945 9月,到中国,为美国新闻处工作
- 1946 秋,重回哈佛大学任教
- 1948 《美国与中国》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 1952 3月10~11日遭控告,到麦卡伦委员会(参议院的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进行陈述
- 1952~1953 以古根海姆基金会学者的身份在日本访问